

职业与天职:韦伯思想略谈

刘 杰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本文简要地分析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的内容,认为韦伯对待学术和政治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学术上,韦伯坚持的是“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政治上,韦伯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激情的政治精神。在对待不同侧面的职业上,韦伯希望兼顾“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梁启超对待职业的“敬”和“乐”的态度与韦伯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天职观;信念伦理;责任伦理;敬业和乐业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1-0042-04

“那时正值春天,我们萌生了爱情。我用我的情歌,迎接着它的诞生,如夏日降临时,婉转啼唱的夜莺,到了成熟时节,才锁住它的喉咙”^①。这是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引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诗。他欲借此诗向眼前各位男女表达心中之愿望:希望诸位真正“恪守原则”、保持清醒,做点促进人类单纯、博爱之事业,等到“成熟时节”来到,成为具有“锁住政治咽喉之使命”的人。至于什么才算作真正恪守原则之人以及怎样才能促进人类之间的单纯和博爱,韦伯在此书里进行了简单而又深刻的阐述。

《学术与政治》一书是韦伯向慕尼黑青年学生发表的两篇演讲的集合,一次是1917年的“以学术为业”^②,一次是1919年的“以政治为业”。当时德国国内的局势非常紧张,因革命引起的政治斗争接连不断,韦伯试图以学术人的身份加入其中。他参加了许多政治竞选活动,申请要做国会议员候选人,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终,他只获得了一个“编外职位”,给内政部提供建议咨询。因此,与辉煌的学术成就相比,韦伯的政治生涯显得比较暗淡,政治建树也很微薄。在此书中,韦伯论述了学术和政治两种职业的具体含义和职业信仰,表达了内心的学术追求和政治倾向,以“学术”、“政治”为名试图确立一种“荣耀上帝”的天职观。

一 科学之信仰

“以学术为业”这篇演讲共有八个小标题,主要围绕三层意思展开论述。首先,韦伯从当时德国的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谈起,介绍德国的教育选拔体制,并与美国的教育体制进行比较。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标题里,韦伯主要讲述了科学领域中的重大发现以及理智化的过程和历史,认为科学的理性化将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和作用。最后,他得出教训和结论说,“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

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即必须使科学的理性化付诸实践,在社会行动中作出“理智的牺牲”。

20世纪初,德国在欧洲处于第一强国地位,整体经济实力稍逊于美国。在那个时代,整个学术领域被政治权力所笼罩,很多人面临着两难境地。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佼佼者,韦伯也不得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因此,演讲的开篇就从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谈起。韦伯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是,既然要把学术当作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就必须知道学术的处境如何。很显然,选择一个决定献身于某一领域的职业,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物质意义,然后才是国家的学术环境。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具体指的是德国当时的教育选拔制度。当时,德国教授的选拔机制非常奇特:教师首先要从“编外讲师”做起,征得学校里相关专家的同意和保证后,方能选择一门课程开课。教师的物质补偿来源于学生的听课费,没有薪水可拿。如果想晋升为正式教授或者学术机构的领导,很多情况下受着机遇的左右。“运气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因为大学教师的选拔机制主要是集体意志选择的结果,集体选择一方面决定于你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要受感情的驱策和左右。教师和学者在当时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学者的定位来源于你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而评价老师的优劣程度决定于听你课的学生人数。因此,“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按照德国当时的传统,大学会同时根据你的研究和教学能力的高低做出裁判,以此决定你适合从事哪种职业。在介绍德国当时的教育选拔体制的同时,韦伯不断地将美国的教育体制与之进行比较。美国的教育体制里没有编外讲师的说法,刚开始从事这一职业的年轻人先从助教做起,帮助正教授安排一些任务,整个过程始终是有薪水可拿。因此相比而言,

收稿日期:2010-12-25

作者简介:刘 杰(1985-),男,陕西安康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

美国当时国内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教授晋升的机会明显优于德国。

在结束对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的讲演后,韦伯把大量精力投入对科学的讨论中,一方面他赞扬科学和理性化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好处,另一方面又批评科学中虚伪的一面。在这里,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文化科学和艺术科学等,是自然和人文的统一体。韦伯探讨科学的用意在于学术领域已经不是幼稚的童年,而是走向专业化过程,学术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职业以及这个社会中心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以学术为业也就意味着要把学术视为科学的职业,牵连一个人的终身职业的抉择。

韦伯认为,热情是科学“灵感”这一关键因素的前提,之前认为的科学变成了“工厂里”的计算问题的观点显得非常无知,科学需要的不仅仅是“智力”,它还需要心灵。同样,计算是科学里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专业人士在这方面表现的非常热情。不仅如此,专业人士的想法取决于工作时的热情和灵感。韦伯批评当时年轻人中很流行的偶像崇拜,旨在说明“个性”和“感觉”是那些有着专业素养的专业人士应有的生活风格,告诫年轻人不要过分陶醉于其中而不能自拔,重申了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全意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观点。

由于经常被后来的科学所取代而显得过时,所以科学不是一件永远让人兴奋的事情,但科学让人愉快的原因也就在此。每一次科学的飞跃都是一次进步,这样的进步是无止境的,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明白科学的意义所在。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理智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达到它想认识的任何事物。因此,科学的面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也就意味着科学为世界除魅。历史上,这种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现于柏拉图时期,科学为世界除魅的工具是观念。只要能够发现和掌握真、善、美、勇气、灵魂等正确的观念,就可以把握科学的真正本质。第二个阶段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工作的伟大认识工具是理性实验。一切只是来源于人们的科学实验,包括从经验上获得的并经过证实了的体验。科学带给人们的第二个好处是科学的思维手段和方法。经过科学训练并掌握科学手段的人可以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找科学问题的解决途径。科学努力使人们达到的第三个目标是头脑的清明。韦伯不赞成教师变成政治家或者煽动家的原因也就在

于此。科学是一项坚持客观价值的职业,在课堂上教师没有必要坚持一种价值判断,成为学生中宣扬某种信仰的人。

对于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死亡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现象科学无法提供终结答案。尽管科学能够带给人们技术进步的意义,尽管科学可以“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过艺术的真实道路”、“通过正真的上帝之路”、“通过正真的幸福之路”,但是科学作为一项职业,却没能能够给我们间接地答案,那么它的价值何在?虽然韦伯没有正面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认为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从“值得知道”这个角度上说,应当是重要的。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终极意义的解释,科学方法不能加以证实,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即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总而言之,科学带给人们巨大的作用是为世界除魅,可以帮助人们从现实的角度获得对“值得知道”的知识,使这个时代不断向理智化和理性化的道路迈进。终极价值或者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早晨将至,黑夜依然”,对于无法确知的命运,我们应当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

二 政治之信仰

韦伯认为,政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他打算从政治团体——国家——的领导权或其影响力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国家最主要的特点是暴力的合法使用,“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韦伯承认,暴力不是国家的常规手段或唯一手段,但暴力却是国家的特有手段。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韦伯还认为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有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力宣称他所具有的权威。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握有权力的人能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然而韦伯疑惑的是,政治家应当具备哪些素质才能正当地行使权力?他如何才能有责任地履行这种权力?这样韦伯把我们带入了伦理学讨论

的领域。他认为,政治家有三个决定性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激情不是指脱离实际的激情,而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这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意识的。政治家徒有激情是靠不住的,他还应当以责任感作为行动的指南,依靠责任感完成政治事业。最后的决定性因素——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被韦伯视为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只有把这三个因素融为一体,才能称得上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人格”的“强大”。以政治为业的另外一层含义是避免政治生涯的“虚荣”。韦伯担心,政治家由于对权力的过分依赖和宠爱,陶醉于权力的股掌之中,而忽视了权力的客观性和责任心。但韦伯认为,“权力本能”属于政治家的正常品质。在这里,他再三提醒政治家不要仅仅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受制于“权力政治”的摆弄。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两种方式并不互相排斥,通常兼而为之。“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上把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靠”政治而生存者是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靠它吃饭。韦伯认为,政治支配权有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型的支配类型,主要代表是世袭制和家族长制。二是魅力型支配,它来源于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政治中靠民众直接认可而当政的统治者、战争头领、伟大的群众煽动家或正当领袖都属于这种类型。最后一种是依靠“法制”和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韦伯最感兴趣的是第二种类型的统治:这种因服从“领袖”的超凡魅力而形成的支配。他认为天职是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历史上,有两类人物可以体现超凡魅力型领袖的期待:一类是巫师和先知;一类是战争首领、帮派首脑和雇佣兵队长,比如拿破仑、丘吉尔等人。

一般而言,政治的运作来源于对权力的使用,而权力的合法性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然而,韦伯相信政治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要和道德要求相匹配。“凡持剑者,必死于剑下”。韦伯说,一个人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圣人,才能被认为是尊贵的道德,这种道德才具有意义,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在

这里,韦伯确立了两个准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以此来区分和指导人们的行为。这样区分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韦伯认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韦伯认为,以政治为业的合适时刻是: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它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三 结语:天职观——亦世俗亦贵族?

韦伯把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看成两个不同的层面和领域。选择以学术为业就要符合科学的态度,坚持科学的观点和手段,投身于为世界除魅的事业中去。尽管科学在涉及终极问题的思考时没能给与更多的支持,但课堂上不应当有煽动家的影子出现。把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真正担当“政治使命”的人是韦伯的理想和追求,但是无论选择哪个领域作为职业,韦伯的观点都是清晰和明确的:献身于自己从事的职业,完成自己正确的天职。

在《学术与政治》中,映入我们视野的近乎是一种以“学者”、“大学教师”、“政治家”等贵族式身份的职业,平民化色彩的世俗职业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韦伯这样安排的直接原因是出于听他演讲的青年学子的处境和自己的感受:眼前大多数青年的未来出路肯定会朝这个方向迈进,而韦伯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也更有可能会寄希望于他们,期盼其中一些人能担当大任,完成政治之神赋予的使命。除了学术和政治这样高贵的神以外,韦伯更希望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唯一的神,不分高低贵贱,不论轻重大小,都愿意倾尽全力为之献身、努力。这种信仰就是韦伯所讲的天职观思想。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新教徒体内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和性格,引领他们从神秘主义走向世俗化生活,通过职业劳动限制自己的欲望,追求财富、珍惜时间、禁止享乐,以一种苦行的方式诏告上帝,获得成为上帝子民的身份和资格,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增耀神的荣光”,满足神的召唤和期待。韦伯的天职观旨在说明一种新的思想和文化方式能够激发人们行动上的改变和反思,希望人们为光耀心中的神而竭尽全力,这种思想的当代意义值得当代人借鉴和学习。

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者梁启超也阐述了相似

的观点。在《敬业与乐业》这篇文章里,“业”具体指的是“正当职业”或者“劳作”,他认为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地劳作。梁启超用“敬”和“乐”两字来讨论对待职业所应采取的态度。“敬业”就是“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按照事情或劳动的性质而言,敬业没有高下、贵贱之分,总统和农民做的是同一性质的事。“敬业”的秘诀在于忠实,庄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便是敬业的意思。用韦伯的话说,敬业是

一种责任伦理,亵渎职业便是不敬、不尽责。对待职业的第二个态度是“乐业”,以业为乐,讲求的是乐在其中。做任何工作,都会有累和厌烦的时候,发点牢骚在所难免,但如果能从“苦业”中寻出些乐趣来,那便是高深的职业境界。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孔子的从业境界非同一般,所以他为人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里的“乐业”相当于“信念伦理”,对待职业要有充分的激情和兴趣,快乐地享受这种生活。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引号中所引内容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韦伯的著作原文,下同。
- ②在德语中,学术和科学的含义相同,科学不仅指狭义上的自然科学,还包括艺术、语言、历史等人文科学。因此,“以学术为业”也被译为“以科学作为职业”。
- [1]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思·韦伯的生平、著作和影响[M].郭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C].吴松点校.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3]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 [4]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慧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苏功勋.理性化机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Vocation and Calling

——A Study of Weber's View

LIU Ji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Science as a Vocation and Politics as a Vocation, considers that Weber attempts to use two strategies on science and politics. Academically, Weber insists 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valuefree; in politics, Weber advocates value judgement. In dealing with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vocation, Weber hopes to put “ethics of conviction” and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together. Liang qi-chao's JingYe and LeYe is in response to Weber's view.

Key words: Calling; Ethics of Conviction;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Jingye and Leye (责任编辑:李进)

(上接16页)

An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Negation

LU J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Changjiang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Negation exist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however, great distinctions have been found between them,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two languages. The production of negatio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not only links with the rules of languages, but also is determined mainly by different contexts and cognitive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people in cultures. Generally speaking, we can summarize two features of English negation in contrast with Chinese negation, which ar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in structure and use.

Key words: English Negation; Chinese Negation; Differences; Analysis (责任编辑:张俊之)